

变革与稳健

银行监管和银行转型的思考

Change and Robustness
On Banking Reform and Supervision

张晓朴◎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014030258

F832.1
149

变革与稳健

银行监管和银行转型的思考

Change and Robustness
On Banking Reform and Supervision

张晓朴◎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北航

C1717135

F832.1
149

责任编辑：戴 硕 董 飞

责任校对：张志文

责任印制：陈晓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与稳健：银行监管和银行转型的思考 (Biangge yu Wenjian: Yinhang Jianguan he Yinhang Zhuanxing de Sikao) / 张晓朴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3

ISBN 978 - 7 - 5049 - 7003 - 9

I. ①变… II. ①张… III. ①银行监管—中国—文集
IV. ①F832.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9645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 //www. chinafph. com](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利兴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30

字数 427 千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7003 - 9/F. 6563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 一

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 10% 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奇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这个奇迹，当然离不开金融业的有力支持。因此，探讨中国经济成长之“谜”，必须回顾和探讨金融业改革和发展之路。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之路堪称一波三折。

从改革开放开始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可称为现代金融体系建立阶段。此间，中国的金融业在形式上基本完成了从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现代金融体系的转变，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保险体系等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就绪，规范这些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活动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初步形成。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金融业在规模上急剧扩张。经济上的赶超操之过急，以及在此过程中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干预，使中国金融体系积累了大量隐患；世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产生了雪上加霜的不利影响。

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全世界几乎无人看好中国的金融业，对于其中的银行业，更普遍持悲观态度。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用不良资产率和资本充足率等专业标准衡量，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整体破产数次，尤以规模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为甚。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的银行业若想健康发展，绝对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进行再资本化。但是，再资本化既要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又要在银行的外部寻求巨额股权资金投入——就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财政实力、金融健康状况和体制改革进程诸方面条件而论，这两个任务根本无望完成。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增添了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的忧虑。因为，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中国的银行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亚洲特色”；如今，亚洲最优秀国家的金融体系已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中国的银行业更难逃破产的厄运。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终于在 20 世纪末下决心对其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财务重组和体制改革。改革的战略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 世纪末，中国政府确定了银行业改革和重组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关键的措施有三：其一，1998 年，定向发行 2700 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填充已为负值的银行资本金；1999 年，将 1.4 万亿元不良资产（其中 9 800 亿元归属四大国有银行）从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相应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承接和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经此处置，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按 1996 年的标准计量，达到了 4%。其二，开始认真实施诸如改革银行管理体制、加强内部管理、执行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考核银行的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等强化银行治理机制的一系列措施。其三，在外部环境上，货币当局正式取消了（1998 年）行之多年的信贷分配，改而对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力求为银行的商业化运行提供适当的市场环境和体制条件。

第二阶段的改革发生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部分为了兑现加入WTO的承诺，部分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体系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于2002年更大规模地推动了银行业的全面改革。主要国有银行（后又扩展到主要的国有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先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财务重组。在对不良资产进行了又一次剥离之后，由中央汇金公司和（或）财政部代表政府分别向各银行注入了新的资本金。在资本充足率大致达到巴塞尔协议Ⅱ标准的基础上，按照“一行一策”的安排，各银行先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托新的股份公司架构，从国际上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大量具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海外机构成为了中国主要银行的重要合作伙伴。自2006年6月中国银行率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先后成功在国内外交易所发行上市，成为国有控股的公众银行。总之，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均已实现了现代公司制改造，并从国内外市场募集了充足的资本金，完成了再资本化。依托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年均10%以上的强劲增长，中国的银行业不仅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了不良资产率，还获得了稳定增长的丰厚利润，并据以跻身于全球最有影响的银行之列。

2007年开始的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凭借雄厚的资本，基于在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实体经济增长，中国的银行业在举步维艰的全球银行业中名列前茅。

然而，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也日趋显著并多样化。这不仅因为与生俱来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如今愈演愈烈，也因为延续数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自外部不断向中国传

递着负能量。这意味着，金融业不断发展，金融风险也日益积累，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且日益尖锐。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通过深化改革，推动金融业进一步转型并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实现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效率，媒介社会资源有效配置。

所有这些，都在热切地呼唤着新的研究。我们显然需要一大批深入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剖析我国金融业弊端，并能结合金融理论最新发展所做的新研究。我以为，晓朴博士的这部《变革与稳健》，就是这样一部深入分析问题并能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的好书。

晓朴博士在社科院金融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由我指导。当然，在结为师生之前我们就相互认识。我对他扎实的理论功底、敏锐的问题感觉和驾驭复杂项目的能力一直有深刻印象。更为重要的是，晓朴一直从事金融管理工作，对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实践和具体运行有切身体会，并始终以浓厚的理论兴趣深入思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部专著，就是晓朴十余年来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银行监管改革深入思考的结晶。它以“变革与稳健”为主题，敏锐地抓住了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精准地切中了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长期挑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相信，这本著作对我国金融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自然地，它对正在展开的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也不乏有意义的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扬

2014年2月12日

序 二

所谓大乱有大治，仿佛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宏观经济与金融制度的深刻变革。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催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理论，而此轮金融危机则对包含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呐喊。几乎每隔 30 年就会出现一轮宏观经济学“革命”，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而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的出现则被称为“反凯恩斯革命”。这体现了现实世界变化对经济理论的最新要求。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有鉴于此，一方面，我们应当让金融因素重归主流宏观经济学，以建立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系统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新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借鉴大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长期规

律，制定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并据此建立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经历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跨越式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入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立足点、阶段和路径，以最切合实际的方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全球各国金融发展的实践来看，金融体系的一般发展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基本方面：

第一，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有一个与之国情相适应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合理结构，二者之间的主次和配比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动态变化，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效率”和“稳定性”的平衡。

第二，商业银行作为一项基本的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继续发挥其在间接融资领域的专业优势，通过改进“代理监管”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物理和技术条件，在原有的组织平台基础上开展新的业务，以适应金融发展一体化的需求。

第三，资本市场作为与金融中介互补的“直接融资”渠道，短期中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可以呈现出与金融中介相互竞争的状态；但从长期稳定的均衡趋势来看，合理的金融体系必须是同时包含二者的互补、互动和渐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四，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伴随着金融创新产生的其他金融组织形式，可以作为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替代者参与竞争，也可以在银行和金融市场之外的特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银行与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

第五，监管体系应当与中央银行紧密协作，一方面促进金融体系的内部元素（如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在效率与稳定性之间维持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机制，实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协调运行。

第六，从制度基础来看，应该有包括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在内的一整套辅助机制，确保金融体系的运行满足“效率”和“稳定性”的双重标准。在效率机制的安排上，诸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必须要有完善的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应该有相应的实现方式，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

第七，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信用意识面临各种外部冲击和开放性变异，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的引导促进契约信用和契约文化的有效扩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文化培育的关键。

不难看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并辅之以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环境的现代金融体系。在此体系当中，占主导地位、享受着国家信用并且在实质上拥有着全额隐性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没有一个强大且具有足够厚度的银行体系作为支撑，金融市场的风险随时可能波及银行体系并最终造成实体经济的巨大衰退。因此，银行体系的发展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问题直接相关。这也正是本书突出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之所在。

从核心议题来看，本书牢牢抓住银行转型与银行监管的主线，

并将其置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之中，从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银行业改革与转型、银行风险管理、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等六个方面阐明了银行转轨和银行监管的重要作用，对据此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系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张晓朴同志是我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中的佼佼者，他在金融监管、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而且长期从事金融管理与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实务工作，这为他走出书斋投身实践，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晓朴长期以来，以理论者与实践者双重身份思考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历程。我相信，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来讲，本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值此新书付梓之际，谈谈读书心得。是为序。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2014年1月25日

前言

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和监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金融业不仅自生能力显著提高，也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然而，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断演进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业务结构、风险形态，都不允许流连过往的成绩沾沾自喜。这也应验了小平同志的论断：“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种种迹象已然表明，金融越发展，应对金融风险的压力就越大。

在银行监管工作中，我时常感受到所在单位的许多领导和同事都有一种愿望，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回首这段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现我们做了大体正确的选择和决策，并因此使得银行业在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支持中国经济实现了比较成功的转型，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拖累或风险源。为了实现这个愿景，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

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所在

从1978年算起，我国经济已持续增长了35个年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出现下降。按照最近的估计^①，2015～2020

^① 参见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2，“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国家”。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将下降到7%，2021~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5.9%。有些预测要悲观一些。尽管如此，如愿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每个人将离习近平总书记阐释的“中国梦”越来越近。如果要问在这一进程中最大的经济风险是什么，我的答案是金融危机，而不是中等收入陷阱或其他。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是最重要和必须坚守的“底线”。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报告，我国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只有4年时间，仍有10年左右的发展时间^①。退一步说，即便2023年中国没有跃升为高收入国家，仍然可以保有发展的成果并继续谋划未来，尽管有可能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与问题。如果遭遇金融危机，后果则要严重得多，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倒退，甚至影响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的危害是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为银行危机支付的代价超过GDP的20%。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智利银行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银行危机，耗费了4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因危机带来的财政成本超过1万亿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从1950年到2001年发展中国家接受的所有的国际援助总和！金融危机可以彻底地摧毁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过去十年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面对金融业发展中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和不断演变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①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认为，进入中上等收入的国家如果在14年内不能跃升到高收入国家，则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参见 Felipe,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06。

二、防范和避免金融危机，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很困难的

不少人误以为，金融危机是小概率事件。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事实上，一部世界金融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历史上金融危机发生之频繁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过去 25 年中，已经有 93 个国家发生了 168 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国际上每年平均发生 6 场金融危机！

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道难题。许多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具有期限错配、高杠杆等内在脆弱性，在管理上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这是导致金融危机反复发生的根源。以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为例，该学说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使得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使得金融本身就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专家和学者坚持认为，只要人性贪婪和恐惧的弱点不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无法避免。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金融监管应需而生。然而，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因为金融监管的产生而绝迹，反而仍然在“押着重复的韵脚”，一次次发生。面对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须承认，金融监管自身也有其局限性，不能包打天下。

其一，尽管从法定职责上看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但实践中金融监管往往肩负多重目标，如促进本国金融体系竞争力的提高等。同时，金融监管者面对的多是移动的靶位，始终要在创新与风险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例如，许多学术研究已证实，金融监管并非越“严”越好，过度的管制或监管反而会加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宽松的监管，如 2007 年美国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盛行的“轻触式监管”，也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种多目标和监管边界的动态演绎事实上增大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监管俘获”产生的概率，影响了金融危机干预的有效性。

其二，从技术上讲，要准确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时点就意味着必须准确

找到“明斯基时刻”，这在目前还没有公认、有效的评估方法。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甚至认为，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彻底搞清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这场金融危机后表示：“历史告诉我们，监管者不可能确定危机发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准确预测危机发生的地点和所要面临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指出，经济学家几乎都未能准确预测危机的性质、爆发时间和损失程度，即使事先发出预警信号的少数学者也只是指出了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一些孤立的脆弱迹象，而无法精确揭示金融体系复杂的关联性和初始冲击的放大与传导机制。在现实中，一方面市场主体并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寻找这个时点；另一方面对系统性风险的判断很难达成一致，市场和监管机构之间会有分歧，监管机构内部也同样会有不同观点。此外，金融危机的种子总是在繁荣时期播下，这也使得金融危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其三，以能否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来衡量，有效金融监管具有不可验证性。金融危机一旦发生，舆论和媒体都会纷纷指责监管缺失或监管不作为，监管者确实也难辞其咎。问题是，如果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前瞻性的早期干预成功化解了一次金融危机，谁又能知道呢？如何去验证呢？这可以被称作是金融危机有效干预的两难困境。积极设计一种有效的监管治理机制激励金融监管者前瞻性地识别和干预金融危机至关重要。毕竟，金融监管者也不是天使。

其四，要成功干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必须付诸行动。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金融危机史已反复证明，试图通过谈话来说服投机者相信他们投机判断和投机方式的错误一般都是无用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作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在市场处于非理性繁荣时，果断出手刺破泡沫，如提高监管标准，禁止高杠杆交易，直接干预资产价格等，这本身需要冒各种风险。市场很可能会众口一词地指责监管者让市场失去了一次加速发展的机会，等等。就像当聚会正热闹时，要把美酒从众人面前眼睁睁拿走，何其难也！‘金

融史专家金德尔伯格认为，金融监管者提醒投机者警惕风险时，要掌握好宣布的时机：一方面，要宣布得足够早以利于市场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应宣布得足够晚以使其更为可信、更引人注目。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美国的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对66个国家和地区、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无论最近的金融狂热或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都与其他国家或过去时期所经历的危机存在极多共同之处。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

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从2009年开始，对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真相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分析和调查，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①。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这场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金融业的舵手和公共管理者忽视了危机发生前经济金融中出现的种种预警信号，缺乏对经济状况的敏感性和探究精神，最终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失控。应当将危机爆发的原因置于人性、个人及社会责任的大背景中予以考量。仅仅将危机爆发归罪于贪婪和狂妄等人性的弱点，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是由于缺乏对人性弱点的问责机制才促成了危机。金融危机并非少数“坏人”就可以造就的，它涉及太多的机构和个人。从根本上说，危机是人类的过失、错误判断和不当行为造成的，政府领导者、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和金融机构高管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由于不可验证性，国际上已有的研究中缺乏对成功避免金融危机的案例研究。事实上，我国1997年和2003年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剥离和注资，很可能已经帮助中国成功躲过了一场危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是，如果没有这两次国有银行改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恐慌的传染，中国

^①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2011,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很可能在 2008 年及随后的几年中深陷金融危机之中。如果金融学也能够像物理、化学那样进行实验，很可能会发现并证实，中国通过改革成功地避免了一次由外部冲击和内部脆弱性叠加而引致的金融危机。同样，2009 年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的规范与处置尚不算晚，阻止了由此而引致的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累积和爆发。

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特意批评了那些认为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论断，指出：如果人们总是重复“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陈词滥调，那将是最大的悲剧。一旦接受了这种观念，危机还将不断重演……

三、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在不断演进

近十年以来，业界对金融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相比之下，金融风险的演变似乎更快。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变化，金融业既面临传统的、基础性的业务合规风险，也面临着业务多元化、复杂化带来的新风险；既面临单体机构的风险，也面临跨业、跨境、跨市场的风险传染，以及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尽管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风险的总量、性质和结构却都在不断演变。

——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业务结构不断演变。过去十年，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随着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和成功上市、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行，我国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金融资产规模高速增长，金融风险的总体水平也随之上升。应当看到，这种风险积聚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叠加，在局部领域甚至可能由量变引发质变。例如，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下，近年来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有增无减，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当属 2008 年至 2009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一度出现的集中、大幅度上升，其影响至今仍在持续。更值得关注的是业务结构的微妙变化。以银行业为例，与十年前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资产中各项贷款的比重已经从 57% 下降到约 50%，个别银行各项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已经不到三分之一。各项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人零售贷款的占比上升明显。这种资产结构的变化记录了我国经济结